



南 帆 | 著

表述与意义生产

BIAOSHU YU YIYI SHENGCHAN



人 民 出 版 社

表述与意义生产

南帆 著



人
民
出
版
社

责任编辑:詹素娟

封面设计:周涛勇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表述与意义生产/南帆 著. —北京:人民出版社,2014.8

ISBN 978-7-01-013882-4

I. ①表… II. ①南… III. ①文学研究 IV. ①I0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4)第 194245 号

表述与意义生产

BIAOSHU YU YIYI SHENGCHAN

南 帆 著

人民出版社 出版发行

(100706 北京市东城区隆福寺街 99 号)

北京中科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2014 年 8 月第 1 版 2014 年 8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开本:710 毫米×1000 毫米 1/16 印张:19.5

字数:310 千字

ISBN 978-7-01-013882-4 定价:50.00 元

邮购地址 100706 北京市东城区隆福寺街 99 号

人民东方图书销售中心 电话 (010)65250042 65289539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凡购买本社图书,如有印制质量问题,我社负责调换。

服务电话:(010)65250042

序

福建师范大学是一所百年学府,肇始于1907年由清末帝师陈宝琛先生创立的福建优级师范学堂,开示福建高等教育的先河和师范教育的优良传统,又承传1908年筹设的福建华南女子文理学院和1915年兴办的福建协和大学两所教会大学的学科积淀,历经百年建设,发展成为东南名校。

我校中文系与校史一样源远流长,主要由福建优级师范学堂国文科、协和大学与华南女院等中文系科发展而来,于2000年改设文学院,现包括中国语言文学、秘书学和文化产业管理三系。文学院的学术源流,既呈现了陈宝琛、陈易园、严叔夏、董作宾、黄寿祺诸先贤奠定的传统国学,又涵衍着叶圣陶、郭绍虞、章靳以、胡山源、俞元桂等名家开拓的现代新学,堪称新旧交融,底蕴深厚。其中,长期为学科建设殚精竭虑而贡献卓著者,当推前后执掌中文系务三十年的经学宗师黄寿祺(号六庵)教授和现代文学史家俞元桂(号桂堂)教授。

随着改革开放的新时代进程,我校中国语言文学学科建设稳步发展,屡有创获。由六庵先生和桂堂先生分别领衔的中国古代文学和中国现当代文学学科,于1979年开始招收研究生,1981年经国务院学位委员会批准为全国首批硕士点;1995年中国语言文学学科由国家教委确认为国家文科基础学科人才培养和科学研究基地;1998年一举获得中国古代文学和中国现当代文学两个博士点,2000年又获汉语言文字学博士点,2001年设立中国语言文学博士后科研流动站,2003年获取中国语言文学一级学科博士授予权,2007年中国现当代文学被评为国家重点学科。此外,还有戏剧与影视学一级学科博士

授予权和博士后科研流动站,国家级特色专业、人才培养模式创新实验区、教学团队各1个和精品课程4门,综合实力居全国同类院系的先进行列。

先师桂堂先生,1942年毕业于协和大学,系国学名师陈易园、严叔夏先生之高足;1943年考入中山大学研究院中国语言文学部,又师从文献学家李笠教授和文艺学家钟敬文教授;1946年获文学硕士后,受严复哲嗣叔夏先生举荐回母校执教,直至退休。1956年起任中文系副主任,协助六庵先生操持系务,1979年接任系主任,至1984年卸任。先生从教五十年,早期讲授中国古代文学和文学批评史,1951年起奉命转治现代文学,晚年创立现代散文研究方向,著有《中国现代散文史》、《桂堂述学》及散文集《晚晴漫步》、《晓月摇情》等,与六庵先生同为我校中文学科德高望重的鸿儒硕老。文学院此次策划出版两套学术文库,分别以两位先师的别号命名,不止为缅怀先师功德,更有传承光大学术门风的深长意味。

《桂堂文库》首批辑录11种,均来自我校现代文学学科群三代学者,包括文艺学、比较文学和语文教育学等学科。老一辈名师中,孙绍振教授以《文学的坚守与理论的突围》汇集他在中外文论、文艺美学和文本解读方面的精品力作,姚春树教授则以《中国现代杂文散文杂论》显示精鉴博识的特色。中年专家有6种,闽江学者特聘教授南帆的《表述与意义生产》畅论当代文论和文学研究的前沿关键问题,辜也平的《多维牵掣下的苦心雕镂》在巴金研究和传记文学探索上有所创获,席扬在《中国当代文学的“历史叙述”和“典型现象”》中阐发学科史和思潮史的新见,潘新和专门论述《“表现—存在论”语文学视界》,赖瑞云则细心探讨文学教育的《文本解读与多元有界》的理论与实践,拙作《现代散文学初探》只是附骥而已。新一代学人有郑家建的《透亮的纸窗》、葛桂录的《经典重释与中外文学关系新垦拓》和朱立立的《阅读华文离散叙事》,在各自领域显示学术锐气。原作俱在,可集中检阅我们学科建设的部分成果和治学风气,我作为当事人不宜在此饶舌,还是由读者独立阅读和评议吧。

汪文顶

二〇一四年夏于福建师范大学仓山校区

目 录

CONTENTS

上 辑

四重奏：文学、革命、知识分子与大众 / 3

底层表述：曲折的突围 / 42

小资产阶级：压抑与叛逆 / 59

现代主义、现代性与个人主义 / 79

再叙事：先锋小说的境地 / 104

启蒙与操纵 / 122

文化先锋、文学性与日常生活 / 144

下 辑

语言的魔力：塑造和囚禁 / 179

文学形式的构成与多边关系 / 198

意义生产、符号秩序与文学的突围 / 225

符号的角逐 / 248

现代性、民族与文学理论 / 270

文学研究：本质主义，抑或关系主义 / 293

上 辑

四重奏：文学、革命、知识分子与大众

上

愈来愈多的人倾向于相信，文学正在消失；或者说，文学退隐了。一个漫长的文学休眠期已经开始。大部分公众已经从文学周围撤离。作家中心的文化图像成了一种过时的浪漫主义幻觉，一批精神领袖开始忍受形影相吊的煎熬。如果没有诺贝尔文学奖的定期颁布，如果不是充当某一部电视肥皂剧改编的原材料，文学已经波澜不惊。当然，文学出版物并没有减少，统计数字仍然节节攀升。但是，文学不再扮演文化先锋的角色。启蒙的口号再度受挫。如今，引人注目的是财政金融，证券市场动向，计算机精英，生物学“克隆”风波，剩下的就是一些明星轶闻和体育消息。一些解嘲式的解释之中，这仿佛是小康时代必然出现的文化局面。这时，也许有必要重提海德格尔的一句著名追问：诗人何为？

回溯历史，诗人曾经作为普通的一员混迹于芸芸众生。鲁迅的《门外谈》戏谑地形容过文学源头的“杭育杭育”派。的确，那个时候的诗并不是什么了不起的魔咒。《毛诗序》云：“情动于中而形于言，言之不足故嗟叹之，嗟叹之不足故永歌之，永歌之不足，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也”^①——这毋

^① 《十三经注疏》，《毛诗正义》卷一。

宁说更像是一种日常的抒情表述形式。按照卢卡契的想象,古希腊的史诗诞生于一个同质的世界之中。那个时候,灵魂的轮廓线与物质的轮廓线并没有什么差别,“史诗赋予内部完美的生活总体以形式”。换言之,主体、客体、内部、外部、文学或者现实之间并不存在清晰的界限。表现即是再现。文学的自律、独立以及文学形式的强制性均是后来的事情了。生活的整体和谐破裂之后,生活意义的内在性成为一个问题。这时的文学形式不得不担负起呈现生活内涵的重任。^①这是文学形式分离出日常话语的开始,也是分裂的现实赋予文学的职责。的确,康德规定纯粹美仅仅是一种孤芳自赏的形式;审美挣脱了现实关系的各种羁绊,艺术仿佛是现实划出的一个杜绝任何欲念插足的特殊区域。理性、道德和审美分疆而治。然而,至少在现今,马尔库塞式的观念更富于启示:自律的艺术形式不是回避现实,而是打入现实,并且以抗拒现存关系的方式成为现实的“他者”,从而开启另一种可能的维度。所以,现今人们仍然有许多理由证明,文学的存在是因为文学的自律和独立,但是,这种自律和独立包含了尖锐的意义。

如果现代社会的文学丧失了尖锐的意义从而与现实达成和解,甚至销声匿迹,这并不是表明那个古老的同质世界又重新降临。很大程度上可以说,这是文学与意识形态的默契。发达的意识形态是现代社会特征之一。人们不再生活在赤裸的、直观的世界,而是生活在无数有关世界的解释之中。屈从于意识形态的强大功能,文学不再是一个刺眼的异数;相反,文学与意识形态的各个门类彼此呼应,协同推动一个巨大的观念体系缓缓运转。在阿尔都塞所论述的“意识形态国家机器”之中,文学与宗教、教育、家庭、法律、政治、工会、大众传播媒介从属于同一个结构,唇齿相依,荣辱与共。^②

阿尔都塞在分析资本主义意识形态时指出:“意识形态是具有独特逻辑和独特结构的表象(形象、神话、观念或概念)体系,它在特定的社会中历史地存在,并作为历史而起作用。”意识形态是作为社会的必要成分分泌出来的,它有效地支配了一个社会的个人心理与集体心理。意识形态不是表明真

① [匈] 卢卡奇:《小说理论》第一部分,杨恒达编译,丘为君校订,台北:唐山出版社1997年版。

② [法] 路易·阿尔都塞:《意识形态和意识形态国家机器》,《外国电影理论文选》,李迅译,上海文艺出版社1995年版,第629—630页。

实的生存关系,而是为社会成员制造“‘体验的’和‘想象的’关系”^①。因此,意识形态把“个体询唤为主体”,进而更大范围地保证了既有生产关系的再生产。^②正是察觉到意识形态的政治功能,特里·伊格尔顿的这几句话鞭辟入里:“意识形态的研究不只是关于思想观念的社会学;它更要具体地表明观念如何与现实的物质条件相联系,如何遮盖或掩饰现实物质条件,如何用其他形式移置它们,虚假地解决它们的冲突和矛盾,把它们明显地转变成一种自然的、不变的、普遍的状态。”^③这就是说,意识形态包含了一种虚构,一种抚慰,一种有意的忘却,或者种种巧妙的话语策略。

作为审美意识形态,文学显然十分擅长上述职能。文学善于生产种种“表象体系”,并且巧妙地夹带一系列意识形态信息。例如,长盛不衰的武侠小说可以轻易地将特定的国家观念、民族观念、性别观念、荣誉观念、等级尊卑观念、善恶忠奸观念塞入某一个寻找武功秘籍或者江湖门派角逐仇杀的故事之中;现代侦探小说无疑必须在法律观念、财富观念、正义观念的支持下运转。的确,相当一部分文学是意识形态的称手工具。很长一个时期内,人们关心的是文学背后个别与一般的关系:个别形象包含了哪些普遍的意义?由于二者的分裂而无法合成“典型”是众多理论家最为焦心的事情。现今看来,“一般”或者“普遍”的阐释毋宁说源于意识形态的主导话语,意识形态决定了何谓“一般”,何谓“普遍”。换言之,形象与意识形态的关系远比个别与一般的关系深刻。通常,大部分文学隐含的生活观念并没有成为意识形态体系之中不和谐的杂音。当然,这也可能在另一方面制造了文学的危机。文学还是不可替代的吗?如果说,现今的广告、时尚、电视肥皂剧、国际电影奖、流行歌排行榜、畅销书、歌舞晚会不约而同地形成了某种意识形态合奏,那么,这个队伍之中的文学只能算一个可有可无的角色。文学的传统感召力正在消失,印刷文明的没落削减了文学的意识形态地位。文学似乎就要

① [法] 路易·阿尔都塞:《马克思主义和人道主义》,《保卫马克思》,顾良译,商务印书馆1984年版,第201、203页。

② [法] 路易·阿尔都塞:《意识形态和意识形态国家机器》,《外国电影理论文选》,李迅译,上海文艺出版社1995年版,第661、635页。

③ [英] 特里·伊格尔顿:《意识形态》,《历史中的政治、哲学、爱欲》,马海良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84页。

退役。

然而,文学的能量并没有完全耗尽。进入文学圈就可以看到,眼花缭乱的文学实验仍然层出不穷。现代主义文学仍然摆出了不屈的反抗姿态。后现代主义文学仍然显示了破除整体性、普遍性钳制的活力。某些文学实验可能被出版商制作成了哗众取宠的海报,这充分显示了市场意识形态具有的强大收编能力。尽管如此,隐藏在文学之中的强大冲击仍然不容忽视。按照乔纳森·卡勒的观点,这种能量也可能冲决意识形态的牢笼。所以,“文学是意识形态的手段,同时文学又是使其崩溃的工具”——这就是现今文学的双重意义。^① 所以,众多理论家必须共同关心这个问题:文学复活的能量从哪里来?

这时必须提到文学与个人感性经验的关系。不论是精雕细琢的细节还是虚构、想象,文学总是以感性经验的形式呈现。这证明了作家与现实的直相遇,也是文学不尽的生机和源泉。生活的深部骤然打开,一个个丰富奇特的现实局部强烈地打动了作家。人物或者故事、对白或者肖像、一片树叶或者一扇窗户,这一切组成的生动可感的现实时常刺破了意识形态的规定,暴露了意识形态的虚伪、矛盾和裂缝,或者澄清意识形态的迷惑、讹误。如果用恩格斯的话表述,这是“现实主义的最伟大胜利之一”^②。“现实主义的最伟大胜利”是一个值得扩展的命题。这个命题可以进一步阐释为文学的感性经验挑战意识形态的逻辑和表象。现实主义的胜利意味着,作家直面的尖锐现实无情地戳破了庞大的意识形态体系。生动的感性经验赋予文学反抗意识形态的能量,文学形式的功能在于将这种能量凝聚为一个坚硬的实体。所以,马克思、恩格斯曾经在同一个时期倡扬“莎士比亚化”而否弃“席勒式”。马克·爱德蒙森的《文学对抗哲学》——一个开宗明义的标题——再度称道了文学拥有的特殊锋芒和能力:“衡量一个诗人的技艺水平,关键要看他是否有能力占有、转化以及超越那些占统治地位的概念模式,他的写作是

① [美] 乔纳森·卡勒:《文学理论》,李平译,辽宁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第41页。

② [德] 恩格斯:《致玛·哈克奈斯》(1888年4月初),《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四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463页。

否能使任何现存理论都无法把它摧毁。”^①不可忽视的是,感性经验通常伴有强烈的情绪震撼,即使静穆也是别一种震撼——尼采称之为日神冲动与酒神冲动。这种混杂的心理现象被笼统地称之为“美感”。这是文学的勃勃生机,也是文学摧枯拉朽的动力。的确,某些意识形态结构就是在读者的哭声或者笑声之中倒塌。

可以预料,许多理论家迅速地意识到美感的危险性。西方文学批评史上,柏拉图对于诗人的憎恶即是第一个著名的案例。柏拉图之所以将诗人逐出理想国的围墙,一个重要的原因即是,诗人煽起了某种难以驾驭的情绪。理性原则遭到了亵渎,丧失了阳刚之气的男人如同女人一样哭哭啼啼,或者沉溺于某种畸形的哀怜癖。这将对健全的灵魂和合理的国度产生巨大的危害。简言之,美感是一个罪魁祸首。无独有偶,中国的古代理论家也始终反对诗人放纵情绪。根据《礼记·经解》的记载,孔子曾经将“诗教”概括为“温柔敦厚”。《毛诗序》如此论述《诗经》的“风”：“上以风化下,下以风刺上,主文而谏,言之者无罪,闻之者足以戒,故曰风。”“故变风发乎情,止乎礼义。发乎情,民之性也;止乎礼义,先王之泽也。”^②这甚至形成了中国诗学之中含蓄、委婉、韵外之致的重要源头。相当长的时期,骚人墨客的吟诗填词仅仅被视为不登大雅的雕虫小技,舍弃不下轻浮的美感不啻玩物丧志。意识形态对于美感的压抑近现代才开始削弱。梁启超论证了“小说与群治”的关系,并且概括了“熏”、“浸”、“刺”、“提”四个特征,胡适、陈独秀等五四新文化的主将利用白话文倡导“人的文学”,改造国民的思想——这一切无不表明,意识形态逐渐将文学与美感解放出来了。当然,解放出来的美感也可能再度为另一种意识形态效力。这是意识形态对于美感的重新征服——二者之间的对抗从未止歇。这个意义上,伊格尔顿对美学的诞生与资本主义意识形态之间的关系作出了别致的解释。在他看来,美学话语“可以解读为专制主义统治内在的意识形态困境的预兆。为了自身的目的,这种统治需要考虑‘感性的’(sensible)生活,因为不理解这点,什么统治也不可

① [美] 马克·爱德蒙森：《文学对抗哲学——从柏拉图到德里达》，王柏华、马晓冬译，中央编译出版社 2000 年版，第 55 页。

② 《十三经注疏》，《毛诗正义》卷一。

能是安稳的。”所以,“美学的任务就是要以类似于恰当的理性的运作方式(即使是相对自律地),把这个领域整理成明晰的或完全确定的表象”。因为人的身体和历史均是不可还原的特殊性和具体的确定性,美学乃是控制这两者的知识和法则。“维系资本主义社会秩序的最根本的力量将会是习惯、虔诚、情感和爱。这就等于说,这种制度里的那种力量已被审美化。这种力量与肉体的自发冲动之间彼此统一,与情感和爱紧密相联,存在于不加思索的习俗中。如今,权力被镌刻在主观经验的细节里,因而抽象的责任和快乐的倾向之间的鸿沟也就相应地得以弥合。”^①这就是说,经过了种种庞大而细致的运作,美学——一种后继而来的理论知识——终于把美感驯服为意识形态体系之中的主动因素。

不论美感与意识形态之间的关系进入哪一种模式,人们都必须承认,意识形态与文学之间可能在某些时刻形成了压抑与反抗的关系。“压抑”这个词很快会令人联想到精神分析学。的确,可以把文学比拟为汹涌的无意识,文学蔑视既定秩序——包括文学史上经典形成的秩序——带来的频繁革命远远超过其他领域。这种品性也是文学时常与社会革命遥相呼应的理由。有趣的是,文学的革命总是极大地解放了文学的生产力。浪漫主义的文学理论曾经认为,诗人吐出了想象的岩浆可以避免破坏性的地震。M. H. 艾布拉姆斯指出,这种想象源于一种观念:“作诗的强烈愿望,是因为人的欲望或者理想与现实世界之间的不调和而产生的。”^②如今,这些略嫌粗糙的理论在精神分析学之中得到了回炉。精神分析学的理论视域之中,欲望与现实原则之间的差距造就了文学;拉康的理论补充了欲望与符号的关系之后,一个完整的解释逐渐形成。当然,这一切可以视为一个隐喻——文学与意识形态关系的隐喻。后者代表了秩序。这个意义上,文学揭示了意识形态有意压抑的社会无意识,揭示了意识形态屏幕之中缺失的历史场景。这时,弗洛伊德构思的家庭传奇剧当然不够用了。回到历史的大舞台,社会无意识当然不仅仅是恋母的性欲。如果扩大弗洛伊德的解释范畴,社会无意识可能是被压迫阶级

① [英] 特里·伊格尔顿:《美学意识形态》,王杰等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3、4、8页。

② [美] M. H. 艾布拉姆斯:《镜与灯》,郇稚牛等译,北京大学出版社1989年版,第213页。

或者阶层的叛逆之声,可能是弱小的民族和国家,也可能是挣扎于男权威压之下的女性意识,总之,一切遭受强制压抑的历史内容。按照弗洛姆——一个具有精神分析学派与法兰克福学派双重血缘的理论家——的分析,意识形态将动员语言、逻辑以及社会禁忌系统共同组成严密的网络阻止社会无意识的浮现。^①文学就是在这样的十字路口选择:或者参与意识形态制订的语言、逻辑、禁忌系统,或者加盟反抗者之列,成为社会无意识的代言。

至少在某些关键时刻,20世纪的中国文学站到了反抗者一边。当然,许多时候的选择发生于纷杂的历史脉络之中,甚至无法泾渭分明。因此,论争迄今仍在持续,“意识形态终结”或者“历史的终结”这一类的口号无形地增添了论争之中某一方的筹码。文学史的回忆为以上的理论图景提供了一大批活生生的主人公。知识分子、大众、政治领袖纷纷登场,启蒙或者革命此起彼伏。现今的文学局面很大程度上源于这几个关键词的历史演变。当然,多数人愿意承认,20世纪之初的五四新文化运动可以视为一系列故事的开端。

1907年的时候,鲁迅曾经在《摩罗诗力说》之中极力提倡“立意在反抗,指归在动作”的文学。然而,文章结束之际,鲁迅不无迷惘地掷笔长叹:“今索诸中国,为精神界之战士者安在?”^②1919年,五四新文化运动终于开启了一扇新的大门。一批新型的知识分子以前所未有的姿态跨上历史舞台。作为五四新文化运动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五四新文学振聋发聩;文学革命的巨大震撼有力地动摇了传统的意识形态结构。无论是叛逆者还是卫道士,所有的人都会意识到某种新的历史内容正在临近。要不要打开所罗门的瓶子?这个主题成为两个集团激辩的战场。当然,首先必须追问的是,哪些幽灵将从所罗门的瓶子里面跑出来?

不论有过多少种近似的概念,“大众”肯定是一个最为常用的命名。五四新文学力图将大众从佶屈聱牙的文言文之中解放出来。封建社会末期,

① [美] 埃里希·弗洛姆:《在幻想锁链的彼岸》,张燕译,湖南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126页。

② 鲁迅:《摩罗诗力说》,《鲁迅全集》第一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102页。

文言文业已形成一个坚固的文化栅栏。大众被隔离于正统文化符号之外,贬为社会无意识。芸芸众生在这个符号系统之中无声无息。他们是缺失的历史。五四时期的知识分子深刻地察觉到社会无意识的能量;这一批反抗者以笔为旗,他们的使命之一是摧毁禁锢大众的压抑机制。他们心目中,盛行于大众之间的白话文无疑是攻击封建意识形态的力比多。白话文登堂入室意味了大众的现身。文学历来是意识形态结构之中最为活跃的环节。白话文开始突围的时候,知识分子理所当然地挑中了这个突破口。无论是胡适《文学改良刍议》之中的八项主张还是陈独秀《文学革命论》之中的三大主义,大众成了文学的题中应有之义。当时,他们的论敌林纾已经意识到,白话文的提倡即是为走卒贩夫、引车卖浆之徒张目。多年之后,胡适在《中国新文学大系·建设理论集》的导言之中承认,这的确是他们倡导白话文的意图。严复、林纾、梁启超等知识分子徒然存有革新救国之心;但是,他们古奥的著作无法赢得大多数人。号召大众共同担负救国的责任,白话文是必不可少的利器。各种尝试表明,白话文的选择是历史的必然。^①换言之,语言的选择是一种激烈的意识形态对抗。如同杰罗姆 B. 格里德尔曾经在《知识分子与现代中国》之中概括地指出的那样,攻击文言文、古代文学和教育传统必将全面波及整个社会制度系统:

儒学……毋宁是一门道德教育课程,目的在宣传一定的社会和政治准则。因而它也是一个精心设计、高度发展、持久存在的垄断社会和政治利益的体系,而这个体系为掌握了基本文化技能的人所享用。对这种靠垄断维持的体系的挑战——文言文、限制其作用的文学规范、体现儒家品位的审美和道德价值的文学——同时也是对构成儒家制度主要支柱之一的精英统治(社会 and 道德)原则的挑战。^②

从文学语言到道德教育体系、社会制度系统——形式与意识形态衔接起来

① 胡适:《中国新文学大系·建设理论集》导言,《中国新文学大系·建设理论集》(影印本),上海文艺出版社1987年版,第5—13页。

② [美]杰罗姆 B. 格里德尔:《知识分子与现代中国》,单正平译,南开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260—261页。

了。的确，弗·詹姆逊在《政治无意识》之中曾经使用了一个概念：“形式的意识形态。”弗·詹姆逊认为，文本的阐释可以在三个同心的框架之中逐渐拓宽。政治历史、阶级话语之后，“历史”的视域是弗·詹姆逊的终极视域。这个视域之中，生产方式、意识形态和文本之中形成了复杂的联动关系。各种的文本代表了“由不同符号系统的共存而传达给我们的象征性信息，这些符号系统本身就是生产方式的痕迹或预示”^①。这个意义上，五四时期文学语言的冲突可以追溯到生产方式的革命。近代史的长期挤压之下，传统的生产方式已经衰朽不堪。崩裂的时刻终于来临。崩裂的表征之一即是，文言文和白话文无法继续相互容忍。五四新文学的功绩不仅提供了一批新型的人物和思想，同时，新的文学形式预示了新的历史。因此，胡适驳回了顽固派对于“文字形式”改革的讥讽，充分地估计了形式的巨大意义。^②当然，不论“形式的意识形态”包含了多少重大的启示，人们都没有理由轻率地删除生产方式到文本之间的诸多环节。或许可以说，这个概念的意义恰恰必须由诸多环节给予有效论证。叙述五四新文学的历史缘起，胡适的眼光超过了陈独秀。陈独秀仅仅用“中国近来产业发达，人口集中”解释白话文的兴旺，胡适表示了异议。在他看来，白话文的兴旺至少还要追溯到其他几个历史原因：一千多年的白话文学，如禅门语录、理学语录、白话诗调曲子、白话小说等；两千多年的“官话”推广；海禁的打开和世界文化的涌入，如此等等。另外，科举制度的废除和满清帝国的颠覆也是不可或缺的条件。^③的确，“形式的意识形态”并不是热衷于描述文本与生产方式之间最短的直线距离，它的涵义分布于全部与文学实践产生联系的社会层面。

《中国新文学大系·建设理论集》之中，胡适的导言和《逼上梁山》均是重要的历史文献。尤其有趣的是，这两份历史文献包含了一个象征：胡适——或者说胡适、陈独秀等一批人——理所当然地充当了这一段历史的叙述者。这一批知识分子均是掌管大众传播媒介的主人。更为重要的是，推动

① [美] 弗·詹姆逊：《政治无意识》，王逢振、陈永国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65页。

② 胡适：《中国新文学大系·建设理论集》导言，《中国新文学大系·建设理论集》（影印本），上海文艺出版社1987年版，第26—27页。

③ 同上书，第15—16页。